

懒悟和陈独秀家人的交往

张庆

安庆的文史学者张皖生先生，生前曾写过一本《陈独秀与皖籍名人》，前前后后涉及30多人，有绩溪的胡适、汪孟邹，有寿县柏文蔚、常恒芳，有六安的高一涵、台静农，最多的还是安庆老乡，像吴樾、潘赞化、刘文典、王星拱、张恨水等。书中还附录了浙江的章太炎、四川的郭沫若、广东的孙中山和叶挺。无论是皖籍的还是他籍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有朋友想写安徽民国史，我想，梳理一下陈独秀的“朋友圈”，就是一部有温度的安徽民国史。

安庆市懒悟艺术馆是一家地域性的民营展馆，有两大收藏体系。其一是安庆迎江寺画僧懒悟的书画作品，其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美术教育体制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立尘表的一道风景；其二是清初、民国到当今已故的安庆历史名人的书画及文献，林林总总逾百件，算得上“兵多将广”。而能扛“帅旗”的，惟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一到五大总书记陈独秀的一幅书法条屏。这幅作品提及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日本的首次会晤，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作为两大灵魂级别的藏品，懒悟和陈独秀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瓜葛呢？

1981年10月2日，《安庆新闻报》的“皖城古今谈”专栏发表了懒悟弟子唐大笠先生的一篇短文《陈昔凡遗稿，懒和尚补就》。文中的陈昔凡，是陈独秀的四叔，因膝下无子，便将陈独秀过继为嗣子。陈昔凡是光绪元年（1875）

举人，任过辽阳的知州、新民的知府。陈昔凡痴迷收藏，是沈阳和北京“崇古斋”古玩店的隐身掌柜。陈昔凡私淑沈石田、王石谷、刘石庵、邓石如，遂命名其居为“四石师斋”。

唐先生文中叙述的是一幅陈昔凡的未竟画稿，为安庆藏家吴云（字信友）先生所得。1947年，吴云请迎江寺的懒悟和尚补就。4年后，懒悟重审又题：

石谷子一派笔调，学者极众，前清我皖姜颖生、陈昔凡两先生当推海内第一。此幅系昔凡先生之遗稿也。丁亥冬吴君信友携来画就其下部，而上半幅只有勾稿未画。吴君喁为补拙，故强试但毫完成此幅。见者勿以我为多事，信有居士一笑。

懒悟并志

懒悟画跋中的石谷子，便是陈昔凡推崇的王石谷。清代画坛，“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翥、王原祁——编者注）一统天下。皖省学“四王”而卓有成就者，如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所论：“陈昔凡、姜颖生皆左清晖（王石谷）而右麓台（王原祁）者也”。而懒悟早年学王石谷亦深谙其妙，故所补部分浑然一体。如果不是题识及“陈衍庶字锡蕃”的白文压脚印，很难分辨是出自两人之手。

兼为懒悟和林散之双重弟子的唐先生，在文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昔凡终生囿于石谷子一家法，未能脱去窠臼，至多只是一把临古的好手；懒悟则不然，他以‘四王’为起点，远溯宋元，晚年力学新安画派，有他自己的建树和独特风格。”

懒悟和陈独秀嗣父陈昔凡的书画缘，成了皖江艺苑的一件趣谈。而懒悟和陈独秀本人有没有交集呢？懒悟1931年寄寓安庆迎江寺时，陈独秀住在上海的法租界。次年10月陈独秀被捕，在国民党的牢里关押了4年10个月零8天。出狱后，陈独秀经汉口抵达四川的江津，在鹤山坪的石院墙度过了其一生最后的岁月。抗战期间，懒悟去往舒城的春秋山、肥西的紫蓬山，辗转到了战时的安徽省政府临时所在地煌（今金寨县），和陈独秀的活动轨迹，基本上是“南辕北辙”。

不过，笔者在查阅懒悟档案时，发现195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懒悟在闽南佛学院读书时，参加过陈独秀领导的学生运动。懒悟是1927年就读于闽南佛学院的，佛学院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毗邻。1924年厦门大学曾发生过学潮，1926年厦门大学的三名年轻学生罗扬才、罗秋天、李觉民组建了福建省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厦门大学党支部。他们受到五四运

动的影响，在学生中广泛传播《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等书刊，进一步推动了厦门大学的学潮。

1927年底，闽南佛学院也闹起了学潮，主张废除僧衣、改穿普通学生装，反对为死人超度，提倡主办学校医院等。懒悟、传戒等被推选为学生会执委，学潮持续了两个多月。1928年3月，懒悟离开厦门回到杭州灵隐寺，传戒则回到家乡江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遭国民党通缉，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具足戒。传戒便是后来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

闽南佛学院的学潮和厦门大学的学潮，或多或少有些干系。至于懒悟参加过陈独秀领导的学生运动，似乎有些牵强。不过懒悟也好、传戒也好，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他们都不不可避免地感触过陈独秀的启蒙思想。所以，在1956年的调查报告中，便有了懒悟在闽南佛学院期间思想上有倾向进步的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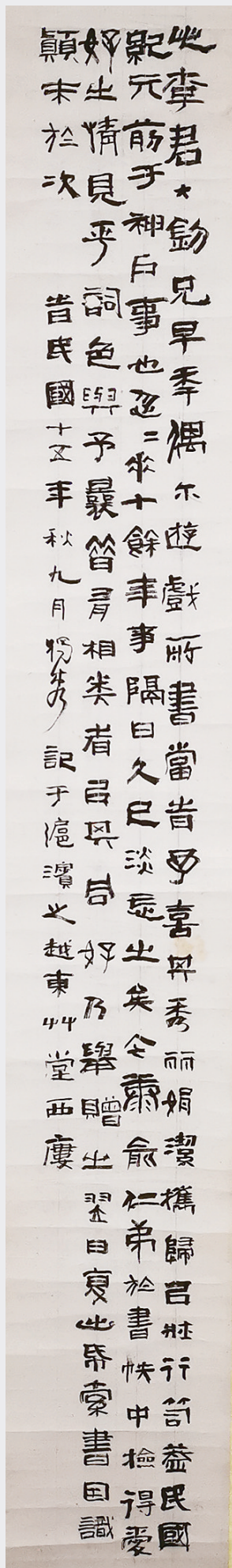
懒悟在灵隐寺结识了杭城的富二代唐云和净慈寺的僧人若瓢及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学生葛康俞。新中国成立后，唐云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若瓢从香港寄寓上海吉祥寺，以兰竹享名画坛。葛康俞是陈独秀的外甥，1950年被聘为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的教授。西子湖畔的一段相识相知，激发了懒悟的艺术潜质。自此，懒悟寄情青灯蒲团，以绘画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被称为中国美术史上的最后一位画僧。

1947年，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侄子陈退年，将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江津运抵安庆，下葬的人群里就有懒悟的旧雨葛康俞、葛康袞（字孝彝）。这一年，葛康俞从国立安徽大学转任南京的中央大学，而陈退年、葛康袞则留在安庆的国立安徽大学任教，他们都是懒悟的方外友。懒悟禅房里张挂的宋代无款百雀图，就是陈退年所赠。懒悟艺术馆里也典藏了一幅懒悟画给孝彝（葛康袞）的山水条屏。而吴云先生所藏的陈昔凡未竟画稿，即为陈退年从北京“崇古斋”带回的旧物。表兄弟、堂兄弟、方外友的一来二往，便有了懒悟和陈松年之间的走动。

1950年代末，懒悟奉调合肥明教寺，恰巧陈松年的二女儿陈长巧考取了合肥工业大学。陈长巧知书达理，得空便到明教寺，陪和尚伯伯说说话。而每次长巧来，懒悟总是嘘寒问暖。懒悟弟子贺泽海先生曾见过古教弩台的凉亭里，有一老一少在唠嗑。那老者，便是懒悟，年少的，便是独秀先生的孙女儿陈长巧。



懒悟画给葛康袞的山水条屏
(作者供图)



陈独秀给葛康俞的手札
(作者供图)